



社科论丛

近代天津商会

宋美云 /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宋美云 / 著

近代天津商会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天津商会/宋美云著.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9
ISBN 7-80563-919-1

I. 近… II. 宋… III. 商会-研究-天津市-近代
IV. F1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9774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项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电子信箱: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天津雍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印	数: 1501~2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近些年,我国研究商会史的学者越来越多,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尚有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开发和研究。在时间跨度上,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1928年之前,关于1928年以后的商会状况,则很少研究。在内容结构上,对商会在城市管理和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作用;洋商商会及其与华商商会的关系;中国商会与外国商会的关系;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有的尚未研究,有的尚不够深入。在个案研究上,目前只对上海、苏州、杭州等少数商会有较全面的研究;对天津、武汉等商会有局部的研究,当然没有必要对每个地方商会都做研究,但是对那些具有某种典型意义的地方商会还是需要比较全面的研究,如天津、北京、大连、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商会,以解剖不同地区的商会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状况和特点。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由宋美云撰写的《近代天津商会》,将给我们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部著作是作者在长期研究天津商会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以其特有的视角,经悉心研究所得的成果。这也是迄今为止的第一部关于北方商会史的区域性研究专著。而且作者在本项研究中利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对近代天津商会的产生与衰亡的全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也可能是目前对某一商会的整个历史进行研究的第一项成果。书中还对商会的运行机制、组织网络系统的建构、参与政治的情况、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以及商会在市场经济和城市管理中发挥的

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细致的分析。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分析天津商会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时,运用了交易成本理论,颇有新意。作者由于有参与编辑《天津商会档案》的经历,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本书具有翔实的资料、扎实可信的论据和言之成理的观点,不失为中国商会史研究中的又一项优秀之作。

虞和平

2002年5月

序 二

中国商会史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已成为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领域。随着大量商会史档案的整理出版和研究成果的推出,这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作用的领域取得了相当成绩,不仅填补了过去研究领域中的许多空白,而且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市民社会、近代社团等等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美云同志在前期参与主编出版过五辑十卷本千万余字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的基础上,撰写的《近代天津商会》一书,将天津商会这一个案放入当时社会经济史变迁的过程中进行考察,揭示了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化与近代天津商会兴衰过程与实质,并对商会的运行机制、组织网络系统的构建、参与政治的情况、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以及商会的市场经济功能和在城市管理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考辨和细致的分析,不乏新见,颇具学术价值。不仅为近代天津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而且必然会对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本书的价值还在于,作者还将“交易成本”的概念运用于解释商人社团的中介性及其作用的论述中,不仅颇有独到之处,而且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商会这一社会团体的理解。与此同时,作者从法学的角度将民国初年政府与商会之间关于《商会法》的争论看作是一

种国家与民间社会交涉的过程。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不但可以确立起共同遵守的统治秩序,而且可以确立起共同守信的文化传统。本书还从广阔对应的地域关系角度,揭示了近代世界经济中天津商会发挥作用的契机和空间,对天津商会与国内外商会网络体系建构的基础、形式、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剖析,对中国经济全面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领域,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参考价值。

《近代天津商会》一书,史料丰富,层次清楚,论据充实,文字顺畅,表述准确。此书的出版,必将大大丰富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新内容,对学术研究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朱荫贵

2002年6月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1)
绪 论	(1)
一、商会研究的兴起	(1)
二、本书的探讨与研究	(6)
第一章 商会的渊源	(12)
一、近代市场的产生与发展	(13)
二、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	(25)
三、晚清商人活动空间的形成	(33)
四、唤起华人觉醒的洋商会	(55)
第二章 商会的兴衰	(65)
一、初生期：商会组织的诞生	(65)
二、发展期：商会组织的健全与完善	(75)
三、转折期：商会组织的发展与困境	(89)
四、畸形期：商会组织的嬗变	(98)
五、衰亡期：商会组织的衰亡	(111)
第三章 商会的运行	(123)
一、商会组织的中介性	(123)
二、商会内部运行的规范性	(137)
三、商会民主开放的原则性	(144)
第四章 商会网络的建构	(152)

一、商会地域性网络的建构	(153)
二、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互动网络的建构	(171)
三、商会与外国商会互动网络的建构	(183)
第五章 商会与市场经济(上)	(201)
一、整顿市场秩序	(201)
二、缓解金融风潮	(210)
三、倡导振兴实业	(223)
第六章 商会与市场经济(下)	(240)
一、注重商情调查	(240)
二、仲裁商事纠纷	(247)
三、抵制苛捐杂税	(266)
第七章 商会与城市社会	(287)
一、创办商务报刊	(287)
二、热心商学教育	(295)
三、主持粮食调运	(305)
四、实施慈善赈济	(310)
五、管理交通市政	(325)
第八章 商会政治参与的评判	(337)
一、参与维护利权运动	(337)
二、辛亥革命中的消极抵触	(348)
第九章 商会与现代化	(359)
一、近代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心理与行为	(359)
二、《商会法》引起的商会与政府之争	(372)
三、现代化进程中商会的作用与局限性	(387)
参考文献	(403)
后记	(409)

绪 论

一、商会研究的兴起

商会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扩大与深度广度的拓展而产生并得以发展和完善的社会经济组织。近年来,社会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观点来看,还是从近代西方的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观点来看,社会经济组织都是对于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正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西方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C. 诺斯所说:“我认为一种经济的实绩取决于这种经济的组织结构。”^①这一语道出了研究社会经济组织的重要意义。

自1903—1949年的半个世纪中,作为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组织——商会,不仅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而且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些年,我国研究商会史的学者越来越多,并出版了大量的有关著作,对中国商会史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商

^① [美] 道格拉斯·C. 诺斯著,陈郁等译:《经济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01页。

会作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突破性的学术进展。

我国近代商会史的研究起步颇晚。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前商会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空白。1983年,徐鼎新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上发表《旧中国商会溯源》一文。这是大陆学者发表的第一篇较详细地集中论述近代商会性质、特点及作用的论文。1985年以后,学术杂志发表的有关商会的论文日渐增多,其中既有从不同角度对近代商会进行论述的文章,也有对苏州、天津、上海等地区商会作个案研究的力作。以20世纪80年代初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为契机,并经过第一、二届资产阶级学术讨论会和80年代后期在苏州举办的以近代中国商会与资产阶级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的进一步推动,预示着国内史学界中国商会史研究高潮的到来。

随着天津社会科学院与天津市档案馆合作整理编纂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于1989年的出版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与苏州档案馆共同合作整理编纂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于1991年的公开出版,商会及相关的研究在90年代逐渐进入高潮,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鼎新、钱小明所著的《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此书是我国第一部商会史专著。同年,朱英撰写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虞和平撰写的《商会与早期中国现代化》。朱英与马敏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一书,同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两年后,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敏撰写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朱英著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于1997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近十年来,学术界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使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形成了一门不大不小的“显学”。

上述颇有分量的专题著作的相继出版和大量论文的发表,足以表明国内商会史研究领域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果,从这些成果中,可以看到商会史研究正在日趋成熟。

商会研究的热浪亦波及台湾地区,仅博士硕士论文便有多篇问世。如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张恒忠撰写的硕士论文题目为《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周佳豪撰写的硕士论文为《天津商会(1903—1916)》;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刘怡青的硕士论文亦以《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为主要史料源,撰写了《商人与军阀政治(1916—1929):以天津为例》。1995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邱澎生则以《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为题撰写成博士论文。稍早,同一单位的研究生李达嘉之博士论文《商人与政治: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1895—1914)》亦以上海总商会为重要讨论对象^①。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商会史的研究,以日本、美国的学者为突出。近年来法国、澳大利亚、韩国学者也日渐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中专门研究近代中国商会问题的论著日渐增多,如曾田三郎著有《商会的设立》(载《历史学研究》第422号,1976年)、仓桥正直著有《清末商会和中国资产阶级》(载《历史学研究》别册号,1976年11月),中文译文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4年下半年)。此外,还有顾琳、金文肇、林原文子等,这些学者的主要关注点是中国早期商会设立缘起、性质、社会职能、历史地位与作用等问题。

西方学者研究近代中国商会史的论著出版较少,美国学者爱德华·罗兹发表了《广州的商人团体 1895—1911》;陈锦江于1977年发表了《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法国著名学者白吉尔发表了题为《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长篇论文。西方学者探

① 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讨的焦点,也是近代中国商会的设立缘起、商会与政权的关系、商会的官办性质、商会的历史地位以及作用等问题。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美国、澳大利亚和台湾、香港地区的一批青年学者,如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张晓波关于 1904—1928 年的天津商会研究的博士论文及陈忠平关于长江中下游商会研究的博士论文。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关文彬先生,威斯康辛大学史瀚波先生等,在这一领域也发表了不少有创见的新成果。

吴承明先生在题为《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一文中谈到:“实证主义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他认为:“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并具有艺术(教育)功能。但是史无定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都可有选择地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用于实证。”

历史研究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实证性研究,一切富有真正科学意义的研究,都必须以坚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商会史研究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大的进展,与这一方面的研究一开始就利用了大量新近发掘出的商会档案分不开,换言之,商会档案的发掘与整理构成商会史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章开沅先生的倡导下,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学者纷纷进入档案馆整理商会档案,拟为商会史的研究提供极其珍贵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1981 年 5 月,在胡光明先生的带领下,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几位治学同仁走进天津市档案馆开发尘封多年的《天津商会档案全宗》。《天津商会档案全宗》是天津商会、与其相邻的京师商会、与其商务往来最密切的上海商会和津京周围的直隶各州县商会,在半个世纪中面对东西方列强军事、政治、经济势力和思想文化方面的高压,国内反动政权的倒行逆施和作为政权机关的合理调控,尤其是来自世界市场和国内区域市场频繁的金融物价风潮的冲击、革命大潮的激荡和洗礼、新时代思潮的感召和启迪,在充当国家政权与成千上万的工商企业之间纽带和桥梁的过程中形成数量最多的系统最完整的居全

国同类档案之冠的历史记录。在此期间,我们认真地对记录了近代天津工商业者经历五十年所形成的卷帙浩繁、洋洋大观的 13967 卷的原始档案历史文献进行了逐句逐篇的全面系统的整理、鉴别、校点和编纂,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 16 年寒暑的辛勤耕耘编纂成的大型资料丛书《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终于面见研究者。

自 1989 至 1998 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共为五辑:第一辑(1903—1911)上下册(1989 年版)、第二辑(1912—1928)共 4 册(1992 年版)、第三辑(1928—1937)上下册(1995 年版)、第四辑(1937—1945)(1997 年版)、第五辑(1945—1950)(1998 年版),全书 5 辑 10 卷 14140 余页共计一千余万字。与此同时,精诚合作的全体同仁不顾编纂档案任务的繁重庞杂,在天津商会档案原始资料基础上,并借鉴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先后发表了自己对近代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学术见解和观点,受到中外学术界——从著名学界巨匠到诸多青年学者的高度关注。今天,《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已为广大学者专家广泛引证,并被欧美、日本和香港、台湾地区多所著名高等学府、学术机构所收藏,并称“为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做出一大贡献”^①。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的出版,以丰富、翔实的原始资料,实证性地揭示了近代中国商会组织——特别是天津及华北区域的商会团体从诞生、成长与发展到逐步衰亡的演变轨迹;真实记录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商会领导成员的构成、组织系统、运行机制、商会网络的构建、经济和社会功能以及在各项活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还具体披露了中外商人与商会、商会与历届中央政权及地方政府的关系,面对社会经济政治风潮各阶层商人的社

① 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会心态,而商会和政权机关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调查,更成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国情的新依据,从而匡正了以往人们对近代中国商会团体的种种误解。因此,著名中国近代经济史专家汪敬虞先生著文指出:“档案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基石。”通过对《天津商会档案全宗》(1903—1950)的全面系统的发掘、整理、编纂和研究,通过对中外近代中国商会史研究现状的初步考察,更加激发我们研究商会的兴趣。

二、本书的探讨与研究

已出版的商会档案资料中,数量最多的当推天津商会档案资料。本书是笔者以长期研究分析天津商会档案资料为基础,悉心思考的最终成果。在对近代中国商会总体风貌已有把握的基础上,我感到可以从专题进行突破,一棵树带有森林的全部信息,但是看一棵树要比看全部森林更清晰。这是我选择近代天津商会作为个案研究的出发点。

笔者自1983年开始,就将近代中国的商会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至今已发表商会及相关论文三十余篇。实际上,在编纂天津商会档案资料的过程中,笔者一直在不断思索,如何在自己和史学界先辈以及同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撰著全面研究近代天津商会的区域性专著,期望能在本书的研究中,以独特的视角提出自己的一些新见解,进一步拓展对商会的研究,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为了实现本书的研究目标,我们必然寻求一种立体的多层次的视野,辨别历史现象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脉络,从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历史面貌的再构成任务。虽说这只是中国商会史的专题研究,但已涉及广阔的领域,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对于我既有诱惑又是挑战。我尽可能地吸收上述学科的成果和方法进行考察分析,但还是较多地应用了我相对熟悉的

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

天津商会是华北区域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的社会经济组织,也可以说是连接北方地区各大城市商会网络的主要枢纽,起了领头羊作用。以天津商会作为主要的研究案例,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可窥视这一时期的京津、华北以及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整个过程。

商会的兴衰过程凸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演变轨迹。近代中国商会是我国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走出封建社会并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产儿。在中国商会成长、发育至衰亡的半个世纪中,即1900—1949年间,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动最深刻、最剧烈的时期。被迫走出中世纪的中国虽然力图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在帝国主义列强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联合打击下,中国仍被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积聚的各种社会力量,都于20世纪的前50年爆发出来。在清末“新政”中诞生的天津商会,经过辛亥革命和清王朝的覆灭,又经历了北洋军阀统治(1912—1928)、国民党前期统治(1928—1937)、八年沦陷(1937—1945)和国民党后期统治(1945—1949年)等历史阶段,直到1950年春被工商业联合会所取代。在中国近代社会空前剧变中,不仅仅是商会团体自身经历了初生、发展到逐步衰亡的蜕变过程,而且也是商会在各届政府采取或是扶持或是限制或是压制几种截然不同政策下历经艰辛一波三折的过程;同时又是商会在面对外国侵略势力及与外国洋商会的关系中经历社会矛盾起伏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因此,要全面、科学地判断近代中国商会的阶级属性、组织构成、社会功能,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中所处地位,特别是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首先应该剖析近代中国商会的整个成长与演变过程;同时还必须研究各个历史阶段上国家管理者主导趋向及其为商会营造的成长环境或提供的活动舞台。目前已出版的近代中国商会史著作多数还仅限于清末—北洋

时期较短暂的历史阶段内。本文将深入探讨天津商会兴衰的整个过程,搞清楚历史时代的主导脉搏,从而对商会行为做出科学判断。

商会构建的区域、国内以及国外的网络,不仅促进了天津近代商业的发展,也为天津加入国际商业贸易营销网络乃至北方和中国的近代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或潜在的成效,同时给近代天津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契机和空间。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被西方列强拖进了广阔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进而使各城市商业之间的商业贸易网络,成为整个亚洲乃至世界商业网络中的重要一环。许多跨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便是在商会网络的参与和组织下完成的。因此,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乃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如何从网络论的角度去认识商会在全国或区域商业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发展变化等问题亟待我们去探讨。历史事实证明,商会是中国近代最活跃的社会群体和经济力量,不仅积极参与国际商业贸易活动,而且是联结世界与内地城镇商人和商业贸易的中心点,进而在世界市场的互动中为中国商人寻找契机和空间发挥积极作用。因而,在研究近代中国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时,我们必须将商会纳入研究的视野中。本书将以近代天津商会为基点,考察区域和全国范围内天津商会扮演的历史角色,兼及商会和商人与亚洲、西欧、美国商会和商人的互动关系。本书将从广阔对应的地域关系角度,揭示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天津商会发挥作用的契机和空间。本书不仅拟对天津商会与国内外商会网络体系建构的基础、形式、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而且还将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多样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等问题上做出透视和阐释。

由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商会活跃于政府与商人之间,并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本书将“交易成本”的概念运用于解释商人社团的中介性的论述中。如果说交易现象存在于一般的社会进程中,那